

近代俄国知识阶层对东方和中国文化的认识

张建华

内容提要：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的俄国思想文化界中，“东方罪恶意识”和“反东方情绪”较为流行。它不仅表现在持极端立场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之中，也表现在持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立场的一些学者的思想之中。

关键词：俄国知识阶层 地缘文化 中国文化 东方罪恶意识

作者简介：张建华，1962年出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世界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俄国（苏联）思想文化史。入选2006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入选北京市社科理论“百人工程”。电话：010-62276916，电邮：zhangjh171@sohu.com

自13世纪40年代以降，来自东方的军事和政治压力和诱惑如影随形般地牵动着俄国的统治者神经，更如梦魇地困扰着俄国的知识阶层。为此，19世纪著名哲学家恰达耶夫发出感叹：“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我们生活在欧洲的东方，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从来不曾属于东方。东方有东方的历史，其历史与我们的历史毫无共同之处。”^①19世纪以来，尤其在克里木亚战争惨败于英法的坚船利炮后，俄国不得不在同时面对强势西方和衰势东方的背景之下，小心翼翼地寻找着自己的国家定位和发展方向。在文化寻根和历史反思过程中，俄国知识阶层对东方文化基本上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的俄国思想文化界中，“东方罪恶意识”和“反东方情绪”较为流行。它不仅表现在持极端立场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之中，也表现在持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立场的一些学者的思想之中。

本文从俄国文化传统的自然地理、文化地理（也即地缘文化）和政治地理（也即地缘政治）的角度，考察俄国知识分子对东方文化的认识、批判以及误读。

一、“中国风”、“东方情调”、“东方罪恶意识”、“反东方情结”及其他

按照历史发展和地理区域的传统划分，一般以乌拉尔山为界，在地理上将俄国版图划分为欧洲（欧俄）和亚洲（亚俄）两大部分，“乌拉尔”（Урал）一词源于突厥语，意为“带子”，它北起喀拉海岸、南抵哈萨克草原，南北共长2000余公里、宽40—60公里，山脉的东西麓的气候、地理、植被、矿产表现了较大的差异。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均起源于欧洲的东部，最终散布于广大的俄罗斯平原之上。

然而在随后的民族迁徙和征战过程中，自16世纪中叶起，俄国的扩张势力越过了乌拉尔山。1563年，伊凡四世就自封为“全西伯利亚君主”，表明了他对西伯利亚的野心。到17世纪40年代，沙皇政府将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纳入自己的版图之中，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6年度规划项目（06JA770005）；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NCET）。

^①恰达耶夫著，刘文飞译：《哲学书简》，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04页。

将俄国的东部国界推至太平洋西岸，使俄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2倍多。俄国自此在自然地理上横跨欧洲和亚洲，浸润于欧洲（西方）和亚洲（东方）两种文化的影响，造成了它在文化地理上和政治地理（地缘政治）上的独特景观，形成了俄罗斯文化多元性和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结合部特征。这是俄国思想文化界和知识阶层所面临的历史遗产。

俄国知识分子是在以下三个前提下认识东方（包括中国）的：

第一，自公元13世纪40年代，鞑靼（蒙古）人的铁蹄踏破东欧土地，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后在伏尔河下游驻留下来，在基辅罗斯的领土上建立了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从此俄罗斯人经历了长达200余年的鞑靼（蒙古）人的统治，直至15世纪80年代获得民族解放。来自东方的异族的长期统治给俄罗斯民族，特别是俄国知识分子留下了极其痛苦的记忆。

第二，中俄两国虽为邻国，但两国相距地域遥远，到1730年才正式建立政府间的外交联系。^①长期以来，两国对对方的地理位置、政治制度、国土面积、民族习俗都不甚了解。在清代早期官方文书档案中，曾经长期把俄国视为原金帐汗国的小藩国，因此称俄国沙皇为察罕汗，或者将“察罕汗”与“俄罗斯国君”“俄罗斯大皇帝”等名称混用，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才统称为“俄罗斯国君”。在清代早期文书和档案中，对俄罗斯的国名也无统一的译法，有“罗刹”“罗禅”“俄罗斯”“鞑罗斯”“鄂罗斯”“察罕汗国”等称呼，17世纪30年代后的外交档案中才较多地称“俄罗斯”。俄国也长期把中国视为西伯利亚以西的一个蒙古汗国，称中国皇帝称为大博格德汗（蒙语：中国皇帝）。此外，清政府中长期缺少懂俄语的人，而俄国人视掌握中文是非常困难的事。^②在早期的交往过程中，一般是由西方中国的传教士通过拉丁语转译中文和俄语。直到1715年俄国派驻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和留学生之后，俄国政府和社会才对中国渐有直接的了解。

第三，17世纪中期以来，东方国家发展为强势的西方殖民势力所阻，1623年英国垄断了印度次大陆的殖民权，1840年中国败于西方坚船利炮。西方派代表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的第六封信中提出了这个论断，“以这两个国家（即中国和印度）的命运为基础，我们可以认识到，若是没有万能之手在其它地方所给予的新的推力，人类将会怎样。您知道：中国从远古起就拥有三件伟大的工具：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这三件工具极大地促进我们人类智慧的进步。然而，这三件工具帮了中国什么忙呢？中国完成环球航行了吗？他们发现过一片新大陆了吗？他们是否拥有更为广博的文献，超过我们在印刷术发明前所有的文献？他们的弗里德里希们和波拿巴们也是在致命的艺术中消耗了自己，就像在我们这里一样？至于印度斯坦，它那起先遭到鞑靼人占领、随后又被英国人占领的可怜命运，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清楚地表明了每一个不立足于直接源自至高理性真理的社会所具有的软弱和僵死。我个人认为，这一作为最古老的自然文明和所有人类知识萌芽之承载者的民族，其不同寻常的毁灭还包含着某种特别的教训。”^③在俄国知识分子眼中，灿烂的东方文化不再辉煌，东方已成落后、颓废、失败和无能的代名词。而且，俄国也品尝了克里木战争中同样败于西欧的坚船利炮的苦果，因此西方派认为俄国断然不能学习东方，更不能成为效尤之蠢辈。

18世纪盛行于西欧的“中国热”对俄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④在上层社会生活中也出现

^① 关于中俄关系起始时间中国学界观点较多。一般观点认为始于16世纪中期，以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为标志。有学者追溯金帐汗国统治俄国以前，证据是在圣彼得堡的爱尔米塔什博物馆里有一件发现于萨拉托夫附近的中国花缎长衫以及大量精美的中国青铜镜，证明在13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的手工业品早已进入俄国。有学者认为始于14世纪的元朝，理由在《元史》中已出现“鞑罗思”的字样。笔者观点的理由是1730年两国政府间第一次规范化的公文往来，即由清政府的外事机构——理藩院直接发文沙皇政府的外事机构——萨纳特（сенат）。

^② 至今在俄语尚保留的俗语中将无法理解或是难懂的东西称为“中国文书”（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ота）。

^③ 恰达耶夫著，刘文飞译：《哲学书简》，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④ 如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的领军人物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认为：“假如世界上有一个政体，或者曾经有过这么样的一个政体，是值得哲学家们注意，同时又值得大臣们去了解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

了“中国情调”。如彼得堡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夏宫里出现了以“中国宫”命名的建筑，使得许多贵族世家纷纷效仿。著名出版家诺维科夫（Н.И.Новиков）在自己所办的讽刺杂志《雄蜂》（Трутень）第8期（1770年2月）上发表了《中国哲人程子给皇帝的劝告》。以赞扬中国文化背景下统治者治国的最高理念“立志“立责”和“求贤”为借口，隐晦地讽刺了当政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叶公好龙”式的“开明君主专制”，最终引起女皇的愤怒，下令《雄蜂》杂志停刊。普希金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也是情有独钟的。他在诗歌中想像着自己已经来到“遥远中国的长城脚下……”普希金甚至在构思长诗《叶甫根尼·奥涅金》时，最初的设想应当提到中国的智者孔子。后来他在彼得堡的沙龙里与俄国第一代汉学家、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雅金福（俗名比丘林）（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神父相遇，知识渊博的神父给普希金讲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神奇故事，并送给有自己签名的书籍。1829年底，普希金给沙皇尼古拉一世和第三厅长官本肯多夫伯爵写信，请求随传教士团赴东西伯利亚和中国考察，但遭到拒绝，未能成行，遂成为普希金毕生憾事。需要说明，俄国此时所接受的“中国意象”完全是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文献中“转译”过来的形象。如闻名18世纪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则是作家苏马罗科夫从德文本《中国悲剧赵氏孤儿》转译而来，名为《中国孤儿》（Китайская сирота）。

在以上前提下和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关于东方和中国的信息的条件下，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对东方和中国的“最初印象”是否定的和消极的。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的俄国思想文化界中，“东方罪恶意识”和“反东方情结”较为流行。它不仅表现在持极端立场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之中，也表现在持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立场的一些学者的思想之中。

首次，俄国思想家们经过深层次反思之后认为，俄国今日政治的不民主和专制独裁，经济上的不发达和工业落后，社会生活上的不活跃和死水一潭，思想文化上的不繁荣和多元划一，甚至包括军事上的不强大和积贫积弱，其责任均应归于蒙古鞑靼的长期统治和东方文化影响，归结为“畏惧的、无力的、使人屈辱的亚洲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东方创立的，并在它的存在的可悲的环境中奴役它，而且现在正在俘虏欧洲的资本政权）中获取的毒素”的影响。^①因为在长达2个多世纪里，中国专制政权长期干预俄国和金帐汗国的内部事务，蒙古的连环保甲制和“巴思哈制”（баскачество）^②长期影响俄罗斯文化，因此俄国不仅在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上受到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消极影响，而且连思想观念也被强加上了极其浓重的“东方色彩”。如俄国哲学家、著名的欧亚主义者维尔纳茨基（В.И.Вернадский）就认为“白俄罗斯”的国名即受中国统文化中地理方位的影响，因为《三辅图》曰：“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证四方。”朱雀（红色）为南方之神，玄武（黑色）为北方之神，青龙（青色）为东方之神，白虎（白色）为西方之神。白俄罗斯居俄国西部，因而得名“白”俄罗斯。^③他还认为，在基辅罗斯时代，世俗王权、教会权力和大众民权是完全平等和友好相处的，而在鞑靼（蒙古）人统治之下和独立之后的莫斯科罗斯时代，以沙皇为代表的专制王权归于一尊，置教会权力和大众民权于统治之下，为所欲为。若将基辅罗斯与莫斯科罗斯时代相比较，就能看出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恶劣影响。

二、“斯拉夫派”与“西方派”视野下的东方

“西方派”代表人物、哲学家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明显地把西方与东方列为互

那个遥远的中国。”另一位重量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宣称：“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参见：伏尔泰著，吴模信译：《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1页）

^① 高尔基著，余一中编选：《高尔基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页。

^② “巴思哈”（Баскак）是突厥语“镇守官”之音译，是蒙古金帐汗国派驻俄罗斯各地的最高统治者。

^③ 巴赫明等编：《俄国在欧亚间寻找自身之路》（Бахмин В.И. В поисках своего пути: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М., 1997.），莫斯科1997年版，第470-474页。

相对立和命运天殊的两条道路。他断言：“东方拥有有益的思想，这一思想曾为理性巨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曾以惊人的力量完成了其使命，但是，这一思想已注定不可能再次登上世界舞台了”，“如今出现了一个新流派^①，主张不再需要西方了，应当毁灭彼得大帝的创造，应当重新回到荒原上去。他们忘记了西方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们不懂得去感激那位给我们以文明的伟人，不懂得去感激那给我们以教益的西方，他们拒绝了西方，拒绝了那位伟大，这一新烤制出的爱国主义满怀激情，已在忙着将我们称为东方可爱儿孙了。”^②被誉为“19世纪下半叶俄国革命派的理想化祖先”^③的别林斯基在《致果戈理的信》中是把“东方的”“鞑靼生活方式”看成是落后的、黑暗的和愚昧的象征。他在1840年写给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的信中谈到俄国落后原因，他写道：“中国是可厌的国家，但更可厌的是一个拥有丰富生活资料、欲像软骨病的幼童般撑在铁架子上才站得起来的国家（指俄国）。”^④他在《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中高调称赞彼得一世改革给俄罗斯民族带来的有益作用，但他也谈道：“彼得大帝要剔除的那些与欧洲主义对立的的东西，并不是我们原有的，而是鞑靼人强加给我们的。俄国人对外国的排斥姿态本身，乃鞑靼桎梏所造成的后果……我们民族性的最重要缺点，无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而是从外面传过来的。”^⑤另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著名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кружок Петрашевский）的领导人彼得拉舍夫斯基（М. В. Петрашевский）也断言：“如果是置身于欧洲，我们俄国人在见识上是毫无疑问是小弟弟；如果是在亚洲人的圈子里，我们就被证明是有权称老资格的。”^⑥斯拉夫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伊凡·基列耶夫斯基在批评俄国社会的落后现象，仍然不忘记将其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认为“迄今为止，我们的民族性还是缺乏教养的，是一种粗鲁的、中国式静止的民族性”，“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矗立着一条中国长城，只有穿过几处洞眼，西方的启蒙空气才能透向我们。彼得大帝以强有力的手，在这座城墙上打开了几扇大门。”^⑦契诃夫于1890年7月来到萨哈林岛考察，完全是一副来自欧洲人和白种人居高临下的踞傲的目光，在他眼里萨哈林岛完全是蛮荒之地，东方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完全是蛮夷之群。他们是“以手指代替钳子拔牙的日本人”和“无妨在森林里像杀狗一样”随着开枪杀死的“中国流浪人”，在这里“婚姻被当做一件无足轻重的事，还不及一场痛饮重要”，于是，“注意地听，时间长了，你会觉得：天哪，此地的生活距离俄罗斯何其遥远！”“我始终觉得，对于土生土长的阿穆尔人，我们俄罗斯的生活方式也是格格不入的，普希金和果戈理在这里没人理解因而也没人需要，俄国历史他们觉得没意思，我们这些来自俄罗斯的人显得像是外国人。”^⑧契诃夫在另一篇短论《在莫斯科》中“想概略地描绘一个莫斯科知识分子”，他笔下的“莫斯科的哈姆雷特”承认自己尽管“衣着入时”“家里陈设豪华”，但“仍然是一个亚洲人，一个缺乏教养的人”“一个完全不文明的人。”^⑨在著名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教程》中时常出现“野蛮的亚洲人”的字眼。^⑩高尔基在1915年发表的《两种灵魂》中认为俄罗斯有两种灵魂，都是外来的，一种来自西方，一种来自东方，俄罗斯一直在两种灵魂中摇

^① 指与其论战的斯拉夫派。

^② 恰达耶夫著，刘文飞译：《哲学书简》，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204-205页。

^③ 柏林著，彭淮栋译：《俄国思想家》，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④ 柏林著，彭淮栋译：《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⑤ 布罗茨基：《早期斯拉夫主义者》（Броцкий Н. Ранние славянофилы. М., 1910.），莫斯科1901年版，第1-61页。

^⑥ 罗杰夫斯基编：《剑桥俄国文化手册》（Nicholas Rzhevsk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 Russian 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⑦ 《基列耶夫斯基全集》（Киреевский И.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 Т. 2.），第2卷，莫斯科1911年版，第60-61页。

^⑧ 契诃夫著，田大畏译：《莫斯科的伪善者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4、121页。

^⑨ 契诃夫著，田大畏译：《莫斯科的伪善者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

^⑩ 如“野蛮的亚洲的实际生活正好和文明的希腊人的地理观点吻合……”（参见：克柳切夫斯基著，张草纫等译：《俄国史教程》，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1页）。

摆，无法摆脱外来文化给俄罗斯民族带来的种种弊端，特别是东方文化。他笔下的东方文化完全否定和贬意的评价。他认为：“东方政治与经济生活黑暗而混乱，可以用个性受压抑、个性的恐惧及共对理智与意志力量的不信任来解释。东方人千百年来一直是，而且现在从整体上讲仍然是‘非现世的’”，“宗教的不宽容性、狂热主义、狂信——这也是东方情感的产物，尽管几乎所有这些情感也都移给了西方的雅利安人……”，“东方在感性而抽象地认识自然力后，就将它们神化，并无意志地服从它们，对一切力都表示驯服，然而西欧人却通过研究自然力而掌握之，力求并正在使这种力服从于人的利益和理性。”他甚至认为：“而我们的贵族所明显具有的对奴仆的残酷及在主子面前的奴颜婢膝——这同对我国人民的所有的阶段都很典型的‘奥勃洛莫夫性格’一起，都是来自东方的。同样可信的还有：不可计数的大批‘多余人’，即各种各样的朝圣者、流浪汉、穿燕尾服的奥涅金、穿树皮鞋和农家呢衣的奥涅金，即内心充满不安和变换所在地的愿望的人们，这也是俄国生活的一种典型现象，这也来自东方，这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逃避生活，逃避事业和人们”。^①如果按文化认同角度来看，高尔基是纯粹的“斯拉夫派”，但是在谈到东西方文化之差异时，他给予西方文化极高的评价。他强调：“对于欧洲，本质的是它强烈表现出来的它的生活和它的基于研究和行动，而不是基于教诲和教条——这些东方古老文化的因素——的文化积极性”，“欧洲文化的目的是成为全球的文化，在自己的劳动中，在自己的思想中把我们星球的人类都团结在一起”，“西方人早就成熟到懂得劳动的世界意义的程度，对他们来说，行动是唯一能使人从古老残余的俘虏中、从束缚个性精神自由成长的环境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原则。”^②如此的比较和如此的言辞，使我们不难看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有“俄国革命海燕”之称的高尔基在东西方文化之较中的价值取向了。

而且就在19世纪中期以后，在俄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个“东方人派”，他们极力鼓吹向东方各国实施扩张和殖民，其理论是：“亚洲——我们一直是属于它的。我们同它生活相通，利害与共。通过我们，东方才逐渐了解自己，才逐渐达到一种高尚的生活……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征服的东西。亚洲各个种族的人民，从血统上、从传统上、从思想上，都觉得和我们很亲切，觉得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只需要更加靠近他们就行了。这个伟大而神秘的东方很容易就会成为我们的”，“俄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关系要比它和欧洲文化和关系更为密切，并且觉得把东方合并到俄罗斯帝国里，使两者融合起来，是俄国的历史使命。”^③

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并不属于“东方人派”，但是他笔下描写东方完全采用消极的以至反动的笔调。他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写道：“中国一国就有4亿居民，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有将近6亿居民，这些居民在这个帝国境内显然住得太拥挤了，于是现在便象一股挡不住的潮水一样，人数日益增多地一群群迁徙，有的去澳大利亚，有的横渡过太平洋去加利福尼亚，最后，还有大批的人可能向北方和西北方移动。那时会怎么样呢？那时，从鞑靼海峡到乌拉尔山脉和里海的整个西伯利亚边区转眼之间就将不再是俄国的了。请想一想，在这个面积（1222万公里）比法国面积（52万8千6百平方公里）大20倍以上的地区有居民不到600人，其中俄罗斯只有260万左右，其他都是鞑靼或芬兰血统的土著，而军队人数则微乎其微。一群群中国人不仅会充斥整个西伯利亚，包括我们在中亚细亚的新领地在内，而且还会越过乌拉尔，一直前进到伏尔加河边，将来怎么可能遏制他们的入侵呢！”他认为：“这就是几乎不可避免地来自东方威胁我们的危险。蔑视这一群群的中国人是不对的。他们人口众多，仅此一点，就已经令人可怕了，令人可怕，因为人口的过渡繁殖使得中国人几乎无法在中国境内继续生存下去了；中国人之所以令人可怕，还因为，不应该按照欧洲商人在上海、广州或买卖城做生意接触的中国商人的情况去评论他们。在中国内地居住的是一

^① 高尔基著，余一中编选：《高尔基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289-290，295，299页。

^② 高尔基著，余一中编选：《高尔基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289-290，295，300页。

^③ 马洛泽莫夫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俄国的远东政策》，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9页。

些受中国文明的摧残少得多，无可比拟更加刚毅而且必须好战的人，他们由于连续不断的、毁灭掉数以万计和十万计的人们内战而养成了战争的习惯。还必须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们开始熟悉了现代武器的使用和欧式的训练——欧洲国家文明的精华和官方的最新成就。只要把这种训练和掌握新式武器、新式战术同中国人原始的野蛮，同他们身上缺乏任何人类抗议的概念、缺乏任何自由的本能的状态，同极端奴隶般地服从的习惯结合起来，而在 1860 年最近这次英法进攻中国以后充斥这个国家的许许多多美洲和欧洲的军事冒险家的影响下，这些方面恰好目前正在结合起来，如果再考虑这些不得不为自己寻找出路的居民多得惊人，那么就会懂得从东方威胁我们的危险有多大了。”他还建议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应该坚决地把自己全部的军事力量调往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带领自己的全体人民去征服东方。”^①巴枯宁实际上是在宣扬“黄祸论”^②，这种论调不仅仅是斯拉夫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体现，其本质则是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印证了。

三、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认识

托尔斯泰(Л.Н.Толстой)于 1828 年出生于贵族家庭，他不仅是著名的作家，同时也是著名的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他曾于 1857 年到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游历，在欧洲他看到了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地位均处于强势增长状况的西方社会的重重矛盾，使他放弃了对西方文化和西方道路的崇拜，变成了“斯拉夫主义者”，但是他在俄罗斯文化中找不到解决西方危机和俄国危机的良药。他对抗沙皇政府和东正教势力表达了极度的不满，期待社会变革，但同时对于日益临近的革命风潮又表示了无端的恐惧。托尔斯泰呼吁“道德自我完善”与“勿以暴力抗恶”，它成为托尔斯泰人生的两大目标，也是他的作品两大主题，并且他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创作上积极付诸实施。在对西方文化和西方道路极度失望之后，从 1880 年开始，他在思想上转向东方文化，开始了对中国思想家孔子、孟子、庄子、老子、墨子等人的学说研究和译介。对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倾心和钻研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直至 1910 年 10 月他离家出走，11 月 7 日病逝于一个小站。

托尔斯泰最先接触的中国文化是佛教，佛教的“出世”“入世”思想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托朋友斯特拉霍夫(Н.Н.Страхов)从彼得堡设法收集一切能搞到的中国哲学家的著作。1884 年，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到：“读佛学，好极了。错误仅在于逃避生活，彻底逃避”。

从托尔斯泰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着迷：“3 月 6 日，我在翻译老子，结果不如我意。3 月 9 日，读了一点关于中国的东西读老子。翻译过来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3 月 11 日，孔子的中庸之道妙极了，同老子一样——履行自然的法则，这就是智慧，就是力量，就是生命。而履行这个法则，会是无声无息的。这个法则只有行于自然冲淡，毫无勉强做作之中，才是最强有力的。我不知道我做这些会有什么结果，不过它已经使我受益非浅”，“3 月 15 日，我的良好的精神状态也在归功于阅读孔子，而主是老子。应当为自己编排一个阅读范围，……人们在谈论癫僧，而我认为老子就是癫僧的哲学”，“3 月 29 日，读孔子，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好。没有他和老子，《福音书》就不全了。而没有《福音书》，他却过得去。”^③

托尔斯泰对孔子的儒家学说也同时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并将其运用于对俄国社会现状的批判。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到：“什么也没有写，在研究孔子，而且非常好。吸取了精神力量。孔子——慎独的学说今还在结出果实……我们的富人阶级使工人破产，把他们置于一刻不停的粗笨的劳动之中，而自己获得闲暇和奢侈。我们不给这些被压迫在劳动之中的人创造

^①巴枯宁著，马骥聪等译：《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227-229、233 页。

^②中国学者李显荣认为巴枯宁是“黄祸论”的始作俑者，而不是德皇威廉二世。(参见：李显荣：《巴枯宁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第 118 页)。

^③《托尔斯泰全集》(Толстой Л.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 1958. Т.49..)，第 49 卷，莫斯科 1958 年版，第 175、198、199 页。

精神之花和生命之果的可能：无论是诗歌、科学、还是宗教。我们在给予他们这一切，我们给予虚伪的诗歌，还有科学——法学，达尔文主义，哲学，沙皇的历史，还有宗教——教会的信仰。多么可怕的罪恶。倘若我们不去吸干他们的血汗，他们也会创造出诗歌，科学和生活的学说。”^①

老子的“无为”思想和儒家学不仅使托尔斯泰认识了中国文化，上述学说甚至成为他在晚年批判俄国社会黑暗势力、专制制度统治以及东正教会的工具，成为他所提出的“勿以暴力抗恶”学说的思想基础。托尔斯泰在1893年所写的《无为》中说：“人们的一切灾难，按照老子的学说，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做需要做的事情，不如说是因为做了不需要去做的事情。因此，人们如果能遵循无为之道，就能够摆脱一切个人的，尤其是社会的灾难，（这位中国哲人主要是指这种社会的灾难）……而我想，他是完全正确的。”^②1891年10月25日，他给彼得堡书商列捷尔列的信中，开列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书目。其中，50—63岁年龄段影响“很大”的有孔子、孟子，影响“极大”的是老子。

1906年10月，托尔斯泰写信给中国学者辜鸿铭，在信中，他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宽厚大量，“中国人民虽然遭到欧洲民族这样多不道德的、极端自私的、贪得无厌的暴行，而直到最近都是用宽宏和明智的平静、宁可忍耐也不用暴力斗争的精神来回答加之于他们头上的一切暴行”，“我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在人类的生活正发生着伟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中国人应该在领导东方民族中发挥重大的作用。”^③

在俄国知识阶层的视野中，东方与西方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文化和两条道路，并且最终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和归宿。缘此出发点，俄国知识阶层在不仅在谈到俄国落后的原因时，而且在谈到俄国未来命运时，要么是将落后原因归结于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恶劣影响，要么是把东方和中国列为“野蛮的”“落后的”“保守的”“污秽的”“黑暗的”“没有前途的”代名词，从而具有强烈的“东方罪恶意识”和“反东方情结”。因此，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精深认识实属罕见，并彰显其弥足珍贵的价值。

^①《托尔斯泰全集》（Толстой Л.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8.Т.54.），第54卷，莫斯科1958年版，第63页

^②《托尔斯泰全集》（Толстой Л.Н.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8.Т.49.），第49卷，莫斯科1958年版，第185，187页。

^③ ③吴泽霖：《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16页。